读史札记

关于满文抄本《格体全录》的几个问题

顾松洁　高　晞

《格体全录》是康熙帝通过在宫廷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等人了解西方医学知识后，命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等用满文翻译的一部西方人体解剖和病理的著作，是18世纪初中西交流的重要成果。此书图文并茂，中、法、俄、日等多国有收藏，图片部分于1928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影印出版，[①] 世人对该书的认识多滥觞于此。《格体全录》在中国医学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通史类专著中被广泛介绍，研究康熙朝西学的传播和传教士的学者对其也多有提及。从不同角度研究《格体全录》的成果亦不少，如日本学者渡边纯成对照此书诸多版本，推断了法藏本和日藏本的版本特征及其源流关系，揭示了东洋文库本的目次，讨论了此书的书名、著作年代、内容编排的原理以及文中所隐含的神学、哲学思想和康熙朝的礼仪之争问题，同时通过对精气、血液循环、淋巴、胰脏、泌尿生殖器官、梅毒、心脏病等人体器官和疾病内容的西学溯源，考察了此书在当时西欧医学史和耶稣会在西欧科学界所占的位置。[②] 美国学者 John M. Saunders 和 Francis R. Lee 对书中 90 幅图片内容进行了汉译，追溯了图像的渊源。[③] 与国外相比，国内的研究相对滞后，对该书版本、内容、成书时间等基本问题的阐述或语焉不详，或说法不一。[④] 在以上先行研究中，日本学者的成果为研究此书的文本提供了范例，然仍有可补充和讨论的空间。基于此，本文重点考察中国和法国的 3 个版本，就以上几个问题提出拙见，祈请方家指正。

[收稿日期] 2020-11-22
[作者简介] 顾松洁（1982 —），女，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讲师，北京 100081，gusongjie1010@163.com；高晞（1965 —），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 200433，gaoxi@fudan.edu.cn
[基金项目] 本文受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立项资助，项目名称“满文《钦定格体全录书》译编”，项目批准号：CCSIC2019−YB05。

① Madsen Victor, Vilhelm Thomsen: *Anatomie mandchoue，facsimilé du manuscrit No. 11 du fonds oriental de la Bibliothèque Royale de Copenhague*, Copenhagen, 1928.《伦敦满文联合书目》著录为《周身血脉图》，见 W. Simon, Howard G. H. Nelson, *Manchu Books in London: A Union Catalogue*,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Limited, 1977, pp.148。

② 渡边纯成：《滿洲語医学書〈格体全録〉について》，《滿族史研究》第 4 号（2005 年），第 22−113 页；《滿洲語医学文献雜考》，《滿族史研究》第 6 号（2007 年），第 96−122 页。

③ John M. Saunders, Francis R. Lee: *The Manchu Anatomy and its Hostorical Origin*, Taipei: Li Ming Cultural Enterprise Co., 1981.

④ 参见于永敏：《康熙帝与满族第一部医学译著〈钦定人体全录〉》，《满族研究》1991 年第 1 期。杨奕望：《康熙朝满文人体解剖著作〈钦定格体全录〉探赜》，《历史档案》2017 年第 4 期；杨奕望：《〈钦定格体全录〉的人体骨骼图及其中国化演变》，《形象史学》2018 年第 2 期；杨奕望：《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藏〈格体全录〉及巴多明附随的亲笔信》，《中华医史杂志》2019 年第 4 期。

一、《格体全录》的版本

满文《格体全录》的存世版本约有 7 种。① 国内收藏有 1 种，保存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下文简称“民大本”），第 1 册封面书汉文“钦定阁议全录书”，为晒蓝本，底本不详，共 6 卷 6 册，上部 4 卷，下部 2 卷，半叶 6 行，无页码。法国藏有 2 种，其中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下文简称“法图本”）内有编译者的具奏贴签和康熙帝朱笔批注、修改的字迹，封面题名为“西医人身骨脉图说”，卷首题名是“钦定格体全录书”；此本共 16 册，内容对应民大本上部，半叶7行，页码系后人标记，含135张插图。②法藏另一种为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所藏精写本（下文简称“法自本”），共 8 卷 8 册，半叶 7 行，第 1 册首页是 1723 年巴多明致法兰西科学院的书信。

日本收藏有 3 种，《东洋文库满蒙书目》中有 2 条著录，一种记 2 函 8 册，半叶 5 行；另一种记 3 函 2 册，半叶 7 行，备注云：第 1 册封面有后世用中文手书题名“钦定阁议全录书”。③据此以及渡边氏的描述，此本与民大本或为同一个版本。第 3 种收藏于大阪的杏雨书屋，半叶 7 行，内容残缺较多。

俄罗斯藏有 2 种，一种系圣彼得堡大学保存本，页面 26×17.5cm，由上、下各 4 册组成，作者是白晋和张诚。④ 此本半叶 7 行，亦带有朱笔修改笔迹。另一种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白晋著，满文译者待考，抄本，656 叶，线装，满文，页面 28×17.5cm，每叶 8 行。”⑤

以上是此书目前存世的情况，本文的讨论主要基于民大本、法图本和法自本三种。在这三个版本中，法图本是稿本，其原文有十余处康熙御笔修订词句，相应部分在法自本和民大本都作修订后处理。如在“论脑”一节描述脑的形状，法图本原文是：fehi i arbun giru, hoto giranggi i doko ergi arbun giru be dahame banjihangge ofi, julergingge golmikan bime muheliyeken, amargingge dukduhun, juwe dalbaingge neciken, dergingge šungkutu noho bime duha i adali mudalime hayame bombonome banjihabi.⑥（译：脑之形状，随颅骨内面形状而长，前略长而圆，后凸起，两侧略平，上面下凹，盘曲堆积如肠。）其中 šungkutu noho bime（“全都下凹，而且”）处朱笔改为 šungkutungge（“凹陷的”），民大本、法自本皆作 šungkutungge。⑦ 又如“论齿”一节开头，法图本原文是 anggai dorgi uman de hadame banjiha šeyen bime nilgiyan ajigesi giranggi, jetere jaka be niyanggūra de baitalarangge be, weihe sembi.⑧（译：牢固长于口内牙床之白滑小骨、用于咀嚼食物者，谓之齿。）此句中 nilgiyan ajigesi（“光滑的小”）用朱笔删划，添加 mangga, uman ci tucime

① 《格体全录》有蒙古文译本，赵百岁等在《最早被译成蒙古文的西医学著作〈格体全录〉》(《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1996 年第 1 期）中指出 1918 年国会议员昭特巴扎巴在北平琉璃厂书店发现此书，于 1929 年译成出版，共 4 册。此本与满文本的关系，尚待研究。

② 据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博士候选人 Alice Crowther 称，此本于 1959 年入藏该图书馆。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 Alice Crowther 的诸多帮助，在此特致谢忱。

③ Nicholas Poppe, Leon Hurvitz, Hidehiro Okada, *Catalogue of The Manchu–Mongol Section of The Toyo Bunko*, The Toyo Bunko &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4, pp. 283–284.

④ K.S. Jachontov, *Katalog mandjurischer Handschriften und Blockdrucke in den Sammlungen der Bibliothek der Orientalischen Fakultät der Sankt–Petersburger Universitä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Publishing House, 2001，pp.107–108.

⑤ 王敌非：《俄罗斯满文文献典藏研究》，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年，第 92 页。

⑥ 《格体全录》第 1 册，法图本，第 38–39 页。

⑦ 《格体全录》第 1 册，民大本，无页码（下同）；《格体全录》第 3 册，法自本，第 75 页。

⑧ 《格体全录》第 3 册，法图本，第 125 页。

banjiha（“硬的、从牙床长出的”），民大本和法自本皆作添加后的词句。[①] 再如“论脊柱”一节，法图本此节前粘有臣工奏语，原文是 si yang ni bithede, žui giyo, dun giyo sehebi. ede acanara gisun be aha be umai baharakū ofi hergen be dahame araha. dergici jorime tacibureo.[②]（译：西洋书中称锐角、钝角。奴才等不得与此相宜之词，是以循此而书。请皇上指教。）žui giyo dun giyo（“锐角、钝角”之音译）左侧朱笔书意译，作 šolonggo hošo, mufuyen hošo，正文相应处俱贴签改作意译。民大本和法自本同样写作意译。[③] 由此推断，民大本和法自本成书于法图本之后。民大本带有法图本中所含编译者贴签的内容，正文字体较潦草，其底本与法图本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法自本装帧考究，黄绫封面，全书以正楷书写，工整美观，无圈涂修改痕迹，第 4、7、8 册文末有校勘记，故它是最终的定本。

民大本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底本在乾隆及其后有流传。如表 1 所示，“医生”一词在法图本和法自本中用汉字“大夫”的音译，民大本作 oktosi，系由 okto（“药”）派生。查康熙朝刊布的《御制清文鉴》用音译，乾隆中叶编纂的《御制增订清文鉴》作意译。满文在乾隆年间经历了一次厘定，该词即为一例。自鸣钟、显微镜、蚕等名词的满文，在法图本、法自本中均用音译，民大本多改为意译，其在两部辞书中或未收，或有意译的词条。类似词汇还有若干，恕不赘述。由此，虽无法判断民大本底本抄成于康熙还是乾隆年间，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在乾隆后期或之后为人所用。

表 1 《格体全录》诸本出现的名词之比较及其在《清文鉴》内收录情况

例词	法图本	法自本	民大本	《御制清文鉴》（康熙四十七年）	《御制增订清文鉴》（乾隆三十六年）
医生	daifu	daifu	oktosi	daifu	oktosi
自鸣钟	dzi ming jung	dzi ming jung	erileme guwendere jungken	无	erileme guwendere jungken
显微镜	hiyan wei ging	hiyan wei ging	badambungga buleku	无	无
蚕	ts’an umiyaha	ts’an umiyaha	biyoo umiyaha	ts’an umiyaha	biyoo umiyaha

资料来源：①《格体全录》法图本第 1 册第 12、14、44 页，第 8 册第 278 页；法自本第 1 册第 2、4、12 页，第 3 册第 79 页；民大本第 1、2 册，无页码。②清圣祖敕撰：《御制清文鉴》，康熙四十七年（1708）武英殿刻本，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卷 13《医巫部》，第 4 页；卷 20《虫部 · 虫类第一》，第 40 页。③傅恒等撰：《御制增订清文鉴》，乾隆三十六年（1771）武英殿刻本，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卷 19《医巫部》，第 14 页；卷 7《乐部 · 仪器类》，第 55 页；卷 32《虫部 · 虫类第一》，第 45 页。

二、《格体全录》的内容

以法自本而言，全书分上、下部，上部 1 至 4 册讲人体构造，下部 5 至 7 册讲人体病症与疗方，第 8 册据卷首题名可知是附加篇目。每册具体目次的满文原文翻译如下：

第 1 册：人性总论，详解人身总论，体态总论，腹腔总论，论皮肤，论浅筋膜（nimenggi alhūwa），论浆膜（yali alhūwa），论肌膜，总论肌肉，论腹肌，论腹膜，论遮护胃肠之腹腔大网膜，论胃，论肠，论肠系膜及膜上血管与腺体，论肝，论胆囊，论脾，论肾，论肾的血管与输

---

① 《格体全录》第 1 册，民大本；《格体全录》第 3 册，法自本，第 53 页。

② 《格体全录》第 9 册，法图本，第 1 页。

③ 《格体全录》第 3 册，民大本；《格体全录》第 3 册，法自本，第 87 页。

尿管，论肾上腺（sahaliyan silhi fulhū），论膀胱、输尿管与输精管，论混有精液的血液运行的脉管，论睾丸，论阴茎（ergen），论子宫，论子宫颈与膀胱颈，论子宫的神经与血管，论分泌阴液的导管、卵巢及输卵管，论受孕，论胎盘，论脐带。

第 2 册：胸腔总论，论乳房，论胸肌，论胸膜，论纵膈，论膈，论心包，论心脏的位置、形状与大小，论心脏，论心腔及血液出入口，论心脏的搏动，论肺，论气管，论肺与气管的神经和血管，论呼吸，论腹内胎儿不呼吸，论食道，论颈，论气管上端，论食道上端。

第 3 册：总论头部原理，论毛发，论头皮，统论面部，论眼，论眼睛的腺体，论眼膜所含三种组织（指房水、玻璃体和晶状体），论眼肌，论眼睛的神经、血管及脂肪，论耳，论耳内，论鼻，论鼻之功用，论口腔，论齿，论舌，论小舌与唾沫，论颅骨，论脑膜，论脑，论颅神经，论脊柱，论颈椎，论胸椎、腰椎和骶骨，论肋骨，论脊髓的性质及发自脊髓的神经。

第 4 册：论胸骨，论肩胛、肩膀和手，论髋以下、足以上之骨骼，论股骨和胫骨，论足骨，论运动头、颈的肌肉，论肩、臂的大小肌肉，论肩膀和前臂的肌肉，论肘至手腕的肌肉，论手腕肌肉，论手指肌肉，论背部和腰部的肌肉，论大腿肌，论小腿肌，论足肌，论足部五趾肌肉，论肩以下、手以上的动脉，论手臂静脉，论髋以下、足以上之动脉，论髋以下、足以上之静脉，论周身血液循环。①

第 5 册：从人之疾病本因论起，论头痛，论头晕，论眼疾，论眼睛第二层膜病症，论眼睛第三层膜病症，论眼膜所含病症，论耳疾，论耳疾续篇，论鼻疾，论鼻疾续篇（包括打喷嚏、流脓血两种），论鼻疾续篇（包括嗅觉受损、鼻子发出臭味两种），论口腔病症，论舌疾，论舌疾续篇，论小舌、上腭病症，论牙痛，论喉疾，论人之气失常的病因，论癫痫，论痰火症（tan ho nimeku，指中风），论半身不遂，论半身不遂续篇，论疯病。

第 6 册：论肝病，论肝病续篇，论胆囊病症，论心脏病症，论小肠病症，论脾疾，论胃病，论呃逆、干呕症，论呕血症，论胃痛、消化不良症，论饮食失调症，论饮食失调症续篇，论胸膜之病症，论肺病，论哮喘、纵膈发炎症，论胸闷、肺脓肿，论痨病，论痨病续篇。

第 7 册：论大肠病症，论大肠、小肠通有之病症，论大肠、小肠通有之病症续篇，论直肠（teru）病症，论肾病，论肾病续篇，论腰痛、肾脓肿、尿崩症，论手、足病症，论膀胱病症，论小便失调等病症，论睾丸病症，论遗精症，论流白等病症，发烧病理统论，论伤寒病，论伤寒病续篇，论疟疾，论瘟疫。②

第 8 册：论有形万物之本源，论食物的消化，总论药物起效快慢之因由，论查验兽禽、牲畜的心肝内脏，论人之气，论睾丸，论妇科病，论月经过多症，论子宫的活动，论子宫浮肿，论子宫囊肿，论白带，论女性淋病，论蜘蛛。③

综观目次，《格体全录》上部第 1 至 4 册论人体构造部分系按总论到分论、由外到内、自上而下的顺序编排，下部第 5 至 7 册论病症与治疗部分以头、胸、腹为序，最后一册包含妇科内容较多。与法自本相比，法图本只有上部，民大本上部同法图本，二者的篇目排序与法自本差异较大，法图本和民大本以头、上肢、胸腹、下肢、内脏、血气为序编排，共 105 条。法自本的顺序则是从腹、胸、头、四肢到全身血液循环，共 100 条。法图本和民大本的第 105 条目次位于法自本下部的第 8 册，法自本所缺之 5 条具体为“论肩胛、肱骨”，“论手骨”，“论拉动肩胛之肌肉”，“论肩、前臂、肘部、手指神经”及“论髋骨”。法图本和民大本中的“论大肠”和

① 第 1–4 册目次见《格体全录》第 1 册，法自本。

② 第 5–7 册目次见《格体全录》第 5 册，法自本。

③ “论蜘蛛”，满文原文作 helmehen i babe gisurehengge。此篇开头很简短地介绍了蜘蛛的特性及其在疾病治疗中的应用，之后引述了法国人罗姆尔（满文 ro mur）所著如何养蜘蛛、产卵取丝、蜘蛛的纺绩器、蜘蛛产丝与蚕虫生丝之多寡比较以及耐磨程度和柔软性等原理。《格体全录》第 8 册，法自本。

“论小肠”2 条，在法自本中合并为“论肠”1 条。此外，法自本中亦有 2 条目次不见于法图本和民大本中，分别是法自本第 81 条“论髋以下、足以上之骨骼”和第 85 条“论肩、手之大小肌肉”。显然，《格体全录》的上部从初稿到定稿经过了结构上的重新编排和内容上的修订。至于下部，与法自本对照，法图本无下部，民大本下部在内容和结构编排上与法自本第 5 至 7 册完全一致，缺第 8 册。至于书内的图片，此 3 本皆有图，因系抄本，各本图像存有差异。另外，民大本下部有两幅植物药材图片，此图不见于法自本。

三、《格体全录》的成书时间与译者

关于《格体全录》的成书时间，于永敏提出约成书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①]，杨奕望推断康熙五十二年完稿[②]，渡边氏断言其执笔于1706年以后[③]。关于此书的译者，各书目的著录和研究者的说法也不一致，书目中有著录为白晋和张诚者，如《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满文写本与刻本目录》，也有著录为白晋和巴多明者，如《伦敦满文联合书目》。研究者多认为《格体全录》是张诚、白晋和巴多明三人合译。

在《格体全录》法图本第 9 册“论股骨和胫骨”一节有一条臣工奏语的帖签，原文译为“《清文鉴》中称连接股骨之骨谓之胫骨，胫骨棱角谓之腿梁，膝盖之下与胫骨相对正中谓之腓。故奴才等将紧邻胫骨所生之骨译作腓骨。此语是否之处请皇上指教。”[④] 这里出现了《清文鉴》，说明在此书上部的翻译过程中已使用康熙四十七年修成的《清文鉴》，所以《格体全录》正式译编的时间可能晚于 1708 年。张诚卒于 1707 年，由此推断他可能未参与。然从他到中国担负的使命及其日记所述，不可否认他对此书所做的基础和贡献。张诚于康熙二十七年同白晋一道抵达北京。白晋此行承担的任务是负责动植物（自然史）和中医的研究，张诚负责中国的现状、警察、官府和当地风俗，矿物和物理学（指医学）的其他部分，即白晋研究以外的部分。[⑤] 结合张诚的日记和白晋所撰《康熙皇帝》，可知二人曾给康熙帝讲解人体解剖学知识。张诚在日记中说：“这份论述消化、营养、血液变化和循环的稿子，虽然尚待写完，但我们已经画出一些足以使人领会的图例。皇上仔细翻阅，特别是关于心、胃、内脏、血管等等部分。他还拿起稿子与一些汉文书籍上的有关记述互相对比，认为两者颇为近似。皇上看完我们的文稿，称赞它条理清楚，很是精妙。”[⑥] 白晋在其书中称：“我们把在本世纪最珍贵、最有价值的有关这门科学的发现全都写进解剖学讲稿里，并写了著名的倍尔尼和王室学者学会其他会员的发现。这些学者对于解剖学的研究和对于其他科学的研究一样，都走在各国学者前面。”[⑦] 遗憾的是张诚和白晋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及关于《格体全录》的具体翻译活动，所以，他们二人参与了多少，不得而知。

巴多明的信中记载：“他（康熙帝）命我把一部解剖学著作和一部医学大全译成鞑靼语。”“皇帝希望先对整部著作有个概念，随之又希望我把它分成几个部分或者说几篇课程；也就是说，每当我誊清十页左右译稿，就要送他御览。”[⑧] 他还说：“我在所知的以拉丁文、法文或意大利文写作的解剖学家中选择了迪奥尼斯（Dionis）先生的著作，我觉得它最清楚、最准确。

---

① 于永敏：《康熙帝与满族第一部医学译著〈钦定骼体全录〉》，《满族研究》1991 年第 1 期。

② 杨奕望：《康熙朝满文人体解剖著作〈钦定格体全录〉探赜》，《历史档案》2017 年第 4 期。

③ 渡边纯成：《滿洲語医学書〈格体全録〉について》，《滿族史研究》第 4 号（2005 年），第 39 页。

④ 《格体全录》第 9 册，法图本，第 29 页。

⑤ 韩琦：《康熙皇帝·耶稣会士·科学传播》，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 年，第 18 页。

⑥ 张诚：《张诚日记》，陈霞飞译，商务印书馆 1973 年，第 71 页。

⑦ 白晋：《康熙皇帝》，赵晨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40 页。

⑧ 巴多明：《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法兰西科学院诸位先生的信》（1723 年 5 月 1 日），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Ⅱ》，郑德弟译，大象出版社，2001 年，第 287 页。

我根据他的顺序和方法做了解释。至于插图，我则喜欢巴托兰（Bartolin）先生的作品，因为它们比其他的更大、刻印得也更好。”① 可见，巴多明编译《格体全录》是确凿无疑的。回到《格体全录》的文本原文，法自本第 8 册全文以康熙帝给巴多明的谕旨和巴多明的具奏构成。开篇即载康熙帝于“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降旨巴多明”，就食物的消化以及药物起效的原理问题令巴多明查西洋书后予以解释。此谕在圣彼得堡大学藏本中有朱笔修订。由此推断，《格体全录》大约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完稿，参照巴多明信中所言“这些译作历经五年方告完成”② 推算，其编译约始自康熙四十九年。据史料记载，白晋在这五年中是受康熙帝之命在研究《易经》。康熙五十年，武英殿总监造和素多次呈进白晋所作《易经》篇目。白晋受命研究《易经》一方面是继承利玛窦的适应政策欲在中国古籍中寻找圣经教义的痕迹，以达到传教的目的，另一方面，康熙帝想通过让白晋研究《易经》证明“西学中源论”，同时应对“礼仪之争”。直到康熙五十五年，随着“礼仪之争”的深入，康熙帝逐渐对白晋研究《易经》失去了兴趣。梵蒂冈教廷图书馆保存有大量白晋研究《易经》的手稿，成书年代多为康熙五十年或稍后，包括《周易原旨探》《易钥》《易经总论稿》《易考》《易引原稿》《易学外篇》《大易原义内篇》《易学总说》《太极略说》等书。③ 据此，笔者以为白晋在这五年期间专注于《易经》的研究，可能无暇顾及《格体全录》的翻译。故推测此书主要的译编任务是由巴多明完成的。

其实，巴多明的西文与满文的互译水平也很可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有一份大约为康熙五十一年的满文朱批，其附有一张卡片、一个红色印泥信封、两页葡萄牙文信件。朱批称：“切勿打开此封套。传苏琳、吉里安告之，本年抵达广东之西洋小船携来方济各信件已由广东巡抚具奏。朕心急，故令巴多明当面启封读之，不甚明白。苏琳、吉里安译后再览。尔等又有何消息乎。” ④ 康熙帝的这份朱谕反映出他对巴多明的满文翻译不甚满意。因此，巴多明信中所说“皇帝之所以确信我能胜任他委派的任务，是因为约十年以来，我奉旨把大量鞑靼文字译成了欧洲文字”,⑤ 多少有自夸的意味。而他所说康熙帝为他配备了“两名汉人学者和两名汉人医生”以及“二十余名能干的司书和校对员”⑥ 应是事实，正是他们共同成就了《格体全录》一书。此外，我们也不能忽略康熙帝对《格体全录》编译过程的关心，巴多明信中称“必要时他亲自修改词语，润色文笔”。⑦

四、关于《格体全录》的书名

《格体全录》之名译自该书满文书名，在法图本和民大本中均为 dergici toktobuha ge ti ciowan lu bithe，⑧ 在法自本中出现的是删去定语“dergici toktobuha（钦定）”后的题名 ge ti ciowan lu bithe，⑨ 这隐约反映出康熙帝从最初欲刊布此书到最终未予颁行的经过。然而，法图本卷首题名中 dergici 一词为贴签，其下原文是 han i（汗的、皇帝的），可知书名原为 han i toktobuha ge ti ciowan lu bithe，这一改动没有朱笔痕迹，可能是臣工在呈给康熙帝之前更改的。查《北京地区

---

① 巴多明：《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法兰西科学院诸位先生的信》（1723 年 5 月 1 日），第 298 页。
② 巴多明：《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法兰西科学院诸位先生的信》（1723 年 5 月 1 日），第 300 页。
③ 韩琦：《康熙皇帝 · 耶稣会士 · 科学传播》，第 86–115 页；张西平：《中西文化的一次对话：清初传教士与〈易经〉研究》，《历史研究》2006 年第 3 期。
④ 《宫中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2–002–000080–0009。
⑤ 巴多明：《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法兰西科学院诸位先生的信》（1723 年 5 月 1 日），第 289 页。
⑥ 巴多明：《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法兰西科学院诸位先生的信》（1723 年 5 月 1 日），第 300–301 页。
⑦ 巴多明：《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法兰西科学院诸位先生的信》（1723 年 5 月 1 日），第 287 页。
⑧ 《格体全录》第 1 册卷首，法图本；《格体全录》第 1 册封面，民大本。
⑨ 《格体全录》第 1 册封面，法自本。

满文图书总目》所收御制类书名，在有清一代御制书中唯独此书满文为 dergici，其他皆为 han i 或 hesei（hese 意为“谕旨、敕命”）。康熙朝御制书籍相应的满文标识有三种：其一，han i araha（直译为“汗写的”），如《御制清文鉴》满文名称为 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① 其二，han i toktobuha（直译为“汗定的”），如《御制星历考原》满文名称为 han i toktobuha sing li k’ao yuwan bithe；② 其三，han i banjibuha（直译为“汗编的”），如《御制性理精义》满文名称为 han i banjibuha sing li jing i bithe。③ 据此，法图本卷首原书名 han i toktobuha ge ti ciowan lu bithe 可译为“御制格体全录”。改动后用了满语 dergici，dergi 一词的本义是方位词，指“上”“东”，引申义指皇上，词尾的 ci 是格助词，表示“自、从、由”等意义。因此，法图本卷首题名的这一改动颇耐人寻味。这关系到满文君主称谓的问题。

关于君主称谓，钟焓在《论清朝君主称谓的排序及其反映的君权意识——兼与“共时性君权”理论商榷》一文中以康熙《御制清文鉴》和乾隆《御制满蒙汉三合切音清文鉴》《御制五体清文鉴》中“君部”所列九个标识君主的不同满语称谓的排序变化指出康熙到乾隆时期对君主名称的排序原则一直是天子—皇帝优先于君（汗）—主（额真），这遵循的是中原王朝的政治传统，即天子和皇帝地位尊贵，君和主的地位相对低一等。④ 在此不妨将《御制清文鉴》中的君主称谓列出如下：abkai jui、hūwangdi、han、tumen se、dergi、ejen、dele、enduringge ejen、genggiyen ejen，⑤《御制清文鉴》无汉文释义。《五体清文鉴》的相关词条如下：abkai jui 天子、hūwangdi 皇帝、han 君、ejen 主、dergi 上、dele 皇上、tumen se 万岁、enduringge ejen 圣主、genggiyen ejen 明君。⑥ 由此可见，无论在康熙朝还是乾隆朝 dergi（上）的排位都在 han（汗）之后。显然，钟焓的提法无法用来解释《格体全录》书名的更改问题。

若此书名中的 dergi 是“东”之意，难免让人联想到学者所讨论康熙朝“西学中源说”的问题。此说在康熙时代流行，认为西方天文历算源自中国。康熙九年，杨光先和汤若望之间的历法之争促使康熙帝开始学习西方科学。康熙帝在四十二年撰成的《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中论及西历传自中国，是其对“西学中源说”的最早表述。康熙帝提出“西学中源说”的目的是为了平息由中西学说不同而产生的争论。康熙五十年二月，康熙帝在给直隶巡抚赵弘燮的谕旨中称：“夫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⑦ 韩琦指出“西学中源”说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称代数学（英文 algebra）为“东来法”，“阿尔朱巴尔”是代数学的音译，是产生于阿拉伯的学科，15 世纪初传到欧洲后得到了迅速发展。耶稣会士在向康熙帝讲解代数学的过程中，很可能会把代数学的词源介绍给他，即代数学来自东方。⑧ 而康熙帝可能是把它理解为源于中国。他安排白晋研究《易经》即有以《易经》为西洋算法之源的想法，其政治意图是为安抚汉人大臣。⑨

白晋研究《易经》是在康熙五十年前后数年间，《格体全录》翻译的几年正值康熙帝对“西学中源说”作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这一复杂背景不得不让人对《格体全录》满文书名中的定语产生“东来”的联想。只是此书没有汉译本，汉文书名本身也是由满文而来，无法获知是否有

---

① 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满文编辑部编：《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 年，第 72 页。

② 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满文编辑部编：《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第 297 页。

③ 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满文编辑部编：《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第 270 页。

④ 钟焓：《论清朝君主称谓的排序及其反映的君权意识——兼与“共时性君权”理论商榷》，《民族研究》2017 年第 4 期。

⑤ 清圣祖敕撰：《御制清文鉴》卷 2“君部 · 君类”，第 1–2 页。

⑥《五体清文鉴》（上册），民族出版社，1957 年，第 252–254 页。

⑦《清圣祖实录》卷 245，康熙五十年二月戊辰。

⑧ 韩琦：《康熙皇帝 · 耶稣会士 · 科学传播》，第 107 页。

⑨ 张西平：《中西文化的一次对话：清初传教士与〈易经〉研究》，第 81 页；韩琦：《康熙皇帝 · 耶稣会士 · 科学传播》，第 113 页。

“东”之意。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时 dergi 是常用的君主称谓，法图本中包括巴多明在内的臣工奏语中俱用该词指称康熙帝。

《格体全录》书名的满文“ge ti ciowan lu”在下部第 5 册开篇“从人之疾病本因论起”一节中有出现。原文翻译如下：“治疗人体疾病的医术是古代贤哲看见病人心生恻然而开始试治并记录下对症的方子，直到（满文 ge rei si ya，拉丁语 Grecia 格雷希亚。——引者注）国额斯居拉布（满文 es gioi lab，拉丁语 Asclepius，希腊神话中的药神。——引者注）方才开始专攻医道，其长子玛噶翁（满文 ma g’a ung，拉丁语 Machaon，系 Asclepius 之子。——引者注）继承父业，世代医病。传至其第十八世孙伊博格拉德斯（满文 i bo ge ra des，拉丁语 Hippocrates，古希腊名医，被誉为西方医学之父。——引者注）时，将从其始祖传下来的种种方子汇集起来，又增添其亲身试过的方子，分门别类，著成第一部书。通过教授学生，医治之道才问世，进而扬名。伊博格拉德斯的子孙循其传统，从医二百余年，四处设立医学院，教授学徒，分辨疾病的种类和药性。有的病因很难辨识，所以开始解剖活的鸟兽，详细观察心肝、内脏、筋脉等的关联。因人畜不同，恐仍有未尽之处，所以解剖犯人进行观察，格体全录（满文原文 ge ti ciowan lu）由此开始。除了原先传下来的药方之外，还考辨各种草木之性，进行实验。将可以配药的一一临摹绘图，写入讲义，编制成书。鸟兽虫鱼等生物中可配药者，亦照前写入讲义中，编制成书。从那时起，此道已然传播、扩增。到了后世，医治之道方才大兴。今世贤哲费心考究，详细编出《格体全录》，正是为了知晓人的病因。”[1] 这段文字讲述的是西方医学史的渊源，从解剖鸟兽到解剖人体，“格体全录由此开始”，由这段记载可知，《格体全录》之“格体”正对应“解剖人体”。汉字中探究万物的规律用“格物”一词，那么关于身体的研究用“格体”一词是相宜的。

五、结语

本文从满文《格体全录》的文本出发，重点梳理了法国和中国藏本的版本情况，通过目次揭示了书中的详细内容，并对成书时间、译者以及书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推测。此书版本丰富，诸本各有特点，具有重要的文献学研究价值。从内容上来看，《格体全录》集合了自 16 世纪以来西方医学界对人体结构、功能、疾病发生的机理和治疗的认识。巴多明在其信中说到他是根据 Pierre Dionis 的著作译出的，即 1690 年出版的 L’Anatomie de l’homme, suivant la circulation du sang et les dernières decouvertes（《基于血液循环和新发现的人体解剖学》）。事实是否如此，尚需进一步研究。

① 《格体全录》第 5 册，法自本，第 1–4 页。